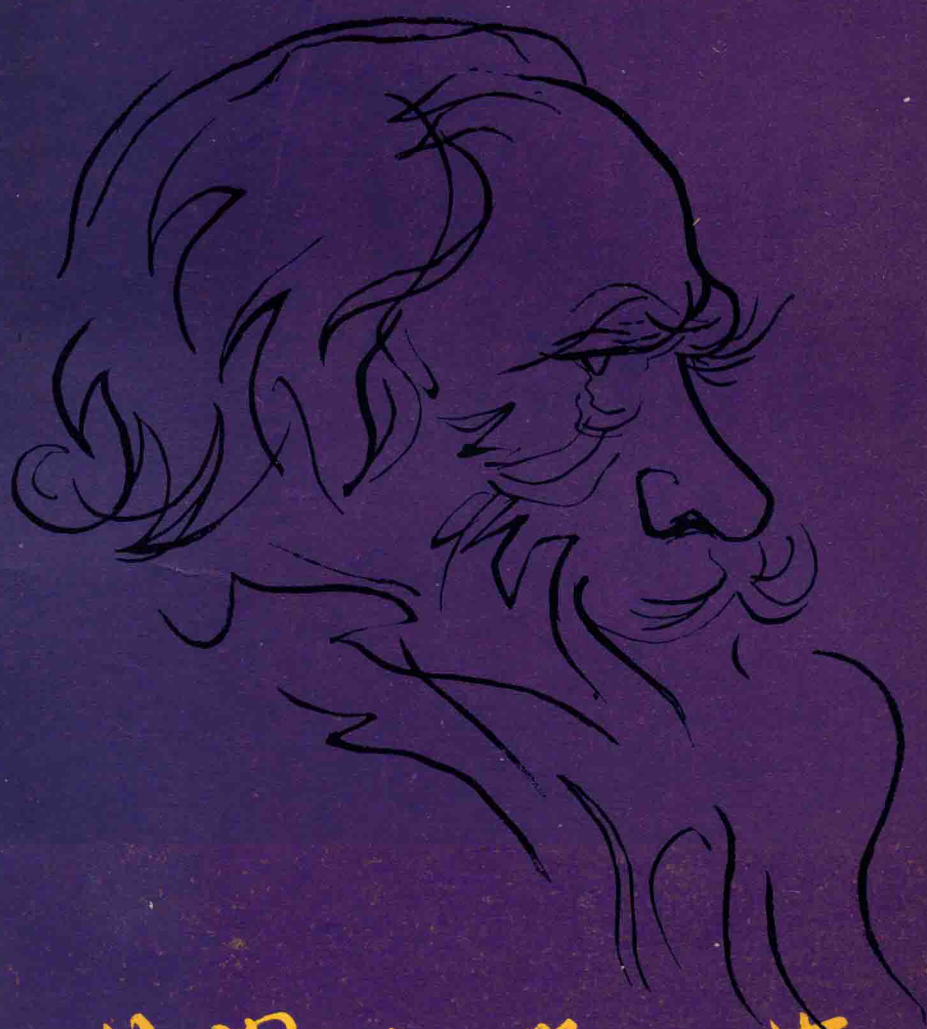


W
1979 (1)

**AIGUOWEN
XUEYANJIU**



外國文學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

(季刊)

1979年第1期

总3期

人道主义笔谈

昨日的人道主义与今日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沈国经(1)

人道主义断想.....周乐群(2)

从读莎氏喜剧的一点感受谈起.....李 鹭(5)

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无容否定.....秦德儒(8)

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柳鸣九(11)

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梦魇.....陈 焜(29)

阴影中的《凯旋门》.....曾 卓(37)

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陶德臻(41)

索马里民族英雄哈桑和他的反帝战歌.....陈 挺(45)

关于农民起义的两部法国文学作品.....罗大冈(49)

略论福楼拜的小说创作.....郑克鲁(62)

启蒙的号角 ——莱辛寓言介绍.....李 淑(70)

威廉·莎士比亚.....杨周翰(74)

淬砺奋发,指点时间 ——读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元 升(85)

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之于我.....徐 迟(88)

论外国短篇小说对鲁迅的影响.....李万钧(91)

关于爱情描写的一点质疑 ——与冯春同志商榷 栾振国 高 崖 (97)

聂赫留朵夫的形象不真实和被美化了吗? 易漱泉 (100)

学术活动

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 (105)

马列文艺论著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 (108)

济金根是不是在正路上? ——札记, 外一则 王先沛 (116)

梅林文艺思想述评 范大灿 (119)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是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吗?

——和张怀瑾同志讨论 包忠文 (132)

阅读与欣赏

永远高唱人民的心声 ——读《瓦普察洛夫诗选》 陈九瑛 (140)

深刻的主题, 独特的构思 ——读普鲁斯的《一件背心》 沈志冲 徐振辉 (142)

《羊脂球》艺术琐谈 尹均生 (144)

休斯的两首诗 杨江柱 (148)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文学故事 (二则)

唐吉珂德与曼布里诺的头盔 (王忠祥) 法国正统派和布索那克 (莫自佳) (152)

国外研究动态

朝鲜文艺界论述作品的政治性和人性相结合等问题 (仪 琳) 罗马尼亚文学在世界各地 (万奉祥)

英国出版《绘图莎士比亚辞典》 (黄育馥) 介绍凯思林·蒂洛琳主编的《查尔斯·狄更斯书信》

第四卷 (黄育馥) 苏联出版《高尔基档案》第十四卷 (苏莱) 日本的新剧作 (童 斌)

补白

葛朗台的家产 (刘尾尾) 7 托尔斯泰创作经验谈 9 布封及其名句“风格即人” (刘文立) 28

书讯:《外国文学五十四讲》即将出版 (少胡) 36 埃斯库罗斯传世之作是哪七部 (李心锋) 84

巴尔扎克和他的人物 (叶继宗) 87 苏联出版托尔斯泰的小资料 104 本刊发行组启事 107

怎样翻译更好 (许国经) 115

致读者作者 编 者 (10)

编后 (151)

封面设计 徐中流

人道主义笔谈

昨日的人道主义与今日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沈 国 经

前不久，一部比较深刻、比较严肃地反映日本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的影片——《望乡》，在国内上映时，竟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刚刚打破“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人们长期被禁锢的头脑还未完全解放的时候，有那么一些人对外来的某些文艺作品表示大惊小怪，这是不足为奇的。

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那一条左的修正主义路线，给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空前的破坏，文艺园地尤甚。而在文艺园地中，外国文学更是一大“禁区”。外国的作品，特别是现代和当代的作品，几乎一律被贬为腐朽、没落、颓废、反动的；对于古典的和近代的积极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几乎一律扣上两条罪状：一曰人道主义或人性论。我对人道主义没有研究，不敢枉论。但也稍微读过几本这类作品，觉得它们所宣扬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或者说人性论，似乎并不像“四人帮”所说的那么可憎可怕，而且较之他们一伙搞的那套封建法西斯主义，似乎要好九十九倍（姑且不说好一百倍，以免涉“全盘肯定”、“盲目崇洋”之嫌）。就拿《复活》里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来说吧，当他看到被他玩弄并遗弃的玛丝洛娃，因为他而遭到悲惨的命运时，他毕竟产生了羞愧和忏悔之心，并且冲破了他的贵族身分所必然带来的伦理上、社交上、舆论上的重重障碍而真诚地去尽心赎罪，挽救玛丝洛娃。对聂赫留朵夫这个典型，我这里不去分析，不过我觉得比起“四人帮”这伙披着“最革命的”外衣的刽子手、恶棍来，聂赫留朵夫的道德水准似乎也要高出九十九倍。

“四人帮”这伙“极左派”，对广大人民实行骇人听闻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党同伐异，陷害无辜，残人唯恐不甚，株连唯恐不广，虽武则天时代的周兴、来俊臣之辈也望尘莫及。但是，他们何尝有过一丝一毫忏悔之意；他们完全是一群残民以逞的人面豺狼。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起码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都嫌过高。

“四人帮”对外国文学作品常加的第二条罪状是“宣扬个人奋斗”。我们姑且不去分析“个人奋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的作用如何。即使是个人奋斗吧，那也不妨同“四人帮”搞的那套封建专制的愚民政策和“焚书坑儒”政策所造成的后果相比较一下，看其危害程度究竟孰轻孰重？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陷于深重的灾难之中。广大青年看不到国家的前途，也很难谈到远大的理想。许多青年甚至只要能找到一个饭碗，便于愿已足，哪里谈到什么个人奋斗！大多数青年处于对革命、对国家、对人民的命运的深深忧虑之中。那时，青年之中也的确有那么一小撮，感到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那就是像一张白卷起家的反革命小丑，打砸抢者，以及靠鼓吹“决裂旧观念”而获得“四人帮”青睐的政治骗子之流。这些家伙都是在“四人帮”卵翼下“应运而生”的反革命毒菌。那时如果能多出几个像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的“个人奋斗”的青年，倒也并不是太坏的事。依我看，似乎比交

白卷之流的小丑也要好九十九倍。

“四人帮”一伙表面上满口革命词句，俨然是共产主义的卫道士，二十世纪的清教徒，实际上他们是男盗女娼。他们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处处设置禁区，似乎如果没有他们的防范和禁止，社会风气就会江河日下，不堪设想；其实正是由于他们推行的那条左的修正主义路线，才造成一部分青年道德败坏，精神堕落的严重后果。“四人帮”表面上似乎是“圣人”，实际上背地里不择手段地专门搜罗那些古今中外最腐朽、最色情的文艺垃圾，去填补他们那极度空虚的灵魂。他们是一伙最无耻的伪君子、两面派。

当全国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奋力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的今天，在我们的思想战线、文艺战线，必须彻底打破一切“禁区”。应该让人民，让我们的青年从“四人帮”所造成的与世隔绝的蒙昧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让他们看看世界，认识一下世界的今天，昨天和前天；了解一下其它国家和民族今天，昨天和前天的精神生活。这对于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开扩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的艺术创作水平和鉴别、欣赏能力，对于培养高度的美学观念与革命情操，都是完全必要的。会不会多少受点毒？也可能。但这又有什么可怕！人们每天吃食物，难道一点糟粕都不会同时吃下去吗？如果那样的话，人的身体里还要排泄器官作什么用？

总之，还是要像鲁迅说的那样，要实行“拿来主义”，首先大胆地拿来，然后加以比较、鉴别，决定学习、借鉴或批判、扬弃，而千万不要做社会主义时代的“孱头”或“混蛋”。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我们一定要用斗争与创造迎来百花烂漫的文艺春天。

人道主义断想

周乐群

一九五七年以后，在我国评论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和课堂里，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种种表现，曾经开展过批判。这种批判，到了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三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出现了两次高潮或者叫做热潮。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政治斗争的客观需要看，批判自有其必要的一面。因为确曾有少数右派分子一度亮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旗号用以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国际上，社会主义的苏联变修了，蜕化了，赫鲁晓夫宣布“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思想体系”①，在苏修看来，共产主义半点也不美妙，只有人道主义才能使它生辉。当时的一些批判也是有分析的，中肯的，充满战斗的进攻精神的。但是，我以为那时也发生过简单化、片面性和离开了历史条件等等严重的缺点。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十多年中，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窃居高位，把持理论宣传阵地，推行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甚至杜撰出一个人们不曾听说的所谓“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对这个没有历史形态、无所不包的思想观念，大张挞伐。后来人们才发现，这是为他们一伙实施封建法西斯主义进行反革命宣传。鲜血淋漓的事实，从反面大大教育了我们。当前，在继续批判这条从“左”面来的修正主义并注意肃清其流毒的同时，也对我们曾经作过的批判工作，提出了重新总结经验的问题。针对林彪、“四人帮”肆意蹂躏社会主义民主，

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法制，有同志愤慨地说，在封建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间，如果只能有这两种选择，那就宁肯要后者。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历史岂容倒转？然而这发自心田的忿激之言，却包括着也许是一代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切身的苦痛经验。

在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道德理想，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尽管欧洲人追根溯源，说它是自古希腊罗马就有的，事实上，人道主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一种社会理想，并且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发展中一再形成波澜壮阔而又复杂跌宕的思想运动。在文艺复兴时期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蒙田、乔叟、培根、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等人的创作中，“人”被看成生气勃勃的大自然中的精美造物，不再仅仅充作“上帝的奴仆”，因而人道主义有了以“人”为本位的内容，要求物质生活享受和个人幸福，进而要求实现个性的解放和知识的积累，于是获得了反对神道的迫切的现实意义。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②并且指出，这些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没有受到资产阶级分工的局限。文艺复兴时期为数不多的巨人所达到的人的发展水平，正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企望的人的和谐发展。

经过资产阶级三、四百年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的实现却仍然渺茫得很。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欧洲文学中人道主义的社会思潮，一方面和基督教博爱主义相融合，在经济学方面的“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③”文学也以同样的真诚宣讲着爱的呓语，对于工人运动有着麻痹、安慰的消极作用，甚至反动作用的一面；然而，追求个人的合理发展，以人的更高发展水平为理想的另一面，往往又成为许多伟大作家观察生活、抨击现实的思想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它在十九世纪积极的、甚至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还应该说是革命的一面。例如，四十五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对于俄国专制农奴制度下农奴的精神追求和个性的美，给予了诗情洋溢的描写。正是《猎人笔记》中的人道主义激情，获得了俄国当时进步舆论的一致肯定，认为在屠格涅夫之前俄国还没有任何人从这样的角度接近人民。可以说，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俄国文学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仍然有着革命的一面。

可是，我们往往习惯于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话，笼统地、简单地认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它的思想基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意义一般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既没有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生活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又没有实际考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文学表现中的具体形式和颇不相同的社会作用，而满足于一般的结论。后来终为林彪、“四人帮”所利用，并加以恶性的发展。他们竟然以“扫荡”资产阶级文学和人道主义为名，行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实。

要给予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还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思想。这是很复杂的问题，“笔谈”栏的短小文章无法说清楚。我在下面写的粗浅理解，可能还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较早的著作中，就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过各各含义不同的“异化”这个哲学用语，指出人类开始从事物质生产时，“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④。不仅劳动者处在与自己的自然创造物的异化当中，而且，当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分离开来，即“真实的分工”实现以后，劳动本身对于劳动者也是外在化的、异己的、敌对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

于人类发展进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过程中，阐明了自己的异化的概念，既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化，也不同于费尔巴哈所认定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提出了更具有历史内容的、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的、劳动的异化这个命题。就是说，在劳动生产物和劳动、客观的劳动条件和主观的劳动力相分离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劳动已经自我异化了，为资本家所占有，被合并于资本了，所以在过程进行中，他的劳动是不断对象化为别人的生产物。⑤”可不可以把劳动的异化，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较早作品中所阐释的异化概念，结合在一起来理解，可不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精神实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了人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和谐发展？不然，又何以理解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因此，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消灭私有制。

在我看来，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界限，就在于是否真正主张消灭私有制及其维护者。但同时也应该说，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确也有着继承的关系，自然是批判的继承。在哪些问题上继承，怎样继承，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了。

人道主义在当代外国文学中起着一种什么作用？有一种意见认为，东方和西方的一些优秀作家（包括在我国名声不好的现代派的优秀作家），相当一部分仍然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并用这种古老的理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资本主义现实提出批判，甚至仅仅表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严肃思考；这些作家的创作应该也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之列。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它是有根据的，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

至于当代苏联文学，我了解得很少。但似乎有两种人道主义的表现值得注意，一种是按照苏修统治集团提倡的人道主义调子，歌唱着虚伪的爱的赞美诗，既为苏修统治集团的国内政策服务，又为霸权主义的国际政策张目。这种苏修官方的人道主义，同十九世纪那种与基督教博爱主义合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另一种是以追求人的合理的生活为目标，运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原则来发泄对苏修统治的不满，尽管有的近乎无力的怨诉，却多少反映了苏修统治下真实的社会情绪。象《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和《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这样的作品，对我们了解今日的苏联，是有一定帮助的。我觉得对苏联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也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至少可以看一看哪些是官方的，哪些是作家真实的感受。我们主张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但对当代苏联某些作品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应该加以批判的阐明，为我所用。

外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大题目。我这里谈的不过是些零碎的感想，以表示支持这次“笔谈”，并向专门家和广大读者请教。

①赫鲁晓夫：《争取持久和平与和平共处》，1958年，俄文版187页。

②《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45页。

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同上，第一卷121页。

④《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上，第一卷35页。

⑤《资本论》，第一卷713页。

⑥《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3页。

从读莎氏喜剧的一点感受谈起

李 鹭

读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人们常会得到各种感受，产生诸般联想，而有时它又不免引起某种共鸣：它仿佛使人见到了明媚的阳光，来到了春天的郊野，嗅到了一阵扑鼻而来的生活的芬芳。这当然与剧中人物的思想性格有密切关系。试看那些喜剧中的主人公，像《第十二夜》中的奥丽薇娅、薇奥拉，像《仲夏夜之梦》中的海丽娜、《爱的徒劳》中的罗瑟琳等等，她们的性格该说是明朗奔放，她们的感情堪称是真挚热烈，她们对生活理想的追求又颇为勇敢而执着，正是这些人物，才使作品不时地出现了动人的生活画面，喷溢着独特的生活气息。寻味之余，我们固然知道，这些喜剧人物所要求的无非是意志的自由，个性的解放，个人生活的幸福，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反映，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骨子里还包含着剥削阶级固有的种种脏东西。但是，它们仍能给人这样的艺术感受。而且，不仅是莎士比亚的喜剧，就是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伯雷特故事集》也莫不如此，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

奥丽薇娅、薇奥拉这样的喜剧人物，是在刚从黑暗浓重的中世纪脱颖而出的文艺复兴时期中产生的。应当说，当时的西欧各国，大体上还是封建社会。古老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酷无情的教会统治，依然如沉沉夜气笼罩着欧洲大地，不少起而反抗的先进人物，不断地为“宗教裁判所”放逐、迫害，甚至活活烧死，但莎士比亚的喜剧人物，却敢于打掉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教会神学圈定的神圣禁区，或欢欣执拗地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或直率地表白自己灼热的爱（如薇奥拉），或向情趣相投的仆人倾吐自己的衷情（如奥丽薇娅），把等级、礼教之类的封建说教，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无所顾忌、勇于追求的伟伟生气，满怀信心、一往无前的乐观精神，无疑是值得赞许的。她们所向往的，当然还不是整个制度的改变，只是个人生活的自由与幸福，而且事实也并未像作品中所写的那么美，仍有其利害的算计，并非“爱情至上”。尽管如此。她们以个人感情为基础的恋爱、婚姻以及这种恋爱、婚姻中所体现的自由、平等，比起完全以家世利益为前提的封建婚姻，夫唱妇随、枯燥无味的夫妇同居，总还有其可爱之处。而所有这一切，又无不是当时已经萌芽、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瓦解着封建主义的统治关系，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应该得到充分肯定。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读莎士比亚喜剧作品时，才不无赞许、欣赏，产生某种共鸣。无庸讳言，存在决定意识，任何思想感情的产生，总有其现实的根源，我们对于莎士比亚喜剧所产生的某些方面、一定程度的共鸣，也是为现实生活的各种需要所决定，否则是决不会有这种艺术感受的。

从这里，也就使我们想到人道主义在今天的作。

莎士比亚塑造出薇奥拉等等这样的理想人物，与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是息息相关的。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进步作家一样，莎士比亚把人性论、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哈姆雷特》中所热情讴歌的：“人类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雷特》，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52页）这首“人类”的颂歌，把“人”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它生动地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即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反对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而其思想基础，则是抽象人性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作家们就以这种人性论、人道主义理论依据来进行创作，并认为在他们的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意志自由、个性解放、友谊爱情的追求乃至纵情享乐等，都是“顺应自然”，出乎天性，是任何力量也阻遏不了的。即使是道貌岸然的修道院院长，也在所难免。“我虽是一个院长，可我也像别的男子汉一样，是一个人呀，”（《十日谈》《第三天·故事第八》）这种人性论、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进步的作用。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文主义作家、思想家的作品，曾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统治和封建制度，为冲破宗教神学的思想牢笼而大喊大叫。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用这种人性论、人道主义直接为震撼全欧的法国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到了十九世纪，它又成了狄更斯、托尔斯泰、乔治·桑、雨果等进步作家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思想武器，虽然同时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过有害的影响。但直至二十世纪，它还是成了罗曼·罗兰等人抗议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依据。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它的社会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弱，消极作用逐步增强，但从总的来说，它依旧这样那样地发生着有益的作用。而在今天来说，它的价值也是不可以完全抹煞的，我们之所以对莎士比亚喜剧中的理想人物的思想，性格有一定的共鸣，不只是为了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且还由于生活中存在着与之尖锐对立的反动腐朽的东西，具有某些不可轻视的实际意义。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其革命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毕竟还残存着宗教迷信、传统的种种封建观念，例如家长作风，特权观念等等。而且还可能出现“四人帮”那样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对于这种落后或反动的意识形态，当然应该以马列主义为武器，进行认真的批判分析，展开坚决的揭露和斗争。但正如列宁在一九二二年所指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若以为单用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工作便能使被全部现代社会禁锢于黑暗无知与偏见境地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与手工业者）迳直摆脱这种黑暗地位，那就是最严重而且是最坏不过的一种错误了，”因此，他认为“应该把各种各样的无神主义宣传材料供给这些民众，把实际生活各方面各种各样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影响他们”，其中也包括“十八世纪革命家底无神主义文献”，虽然从中可以找到“许多不合科学，又很幼稚的东西。但谁也不妨碍出版人把这些作品加以删减并附以简短的跋文，指出人类从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在用科学态度批评宗教方面所达到的进步，指出这个问题的最新著作等等”^①。列宁的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宣传唯物论反对宗教迷信而说的，但它却体现着无产阶级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即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尽力扩大同盟者，纵然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52页），以战胜较强大的敌人。这

^①《论战斗底唯物主义》、《马恩列斯论哲学史》。

种思想文化方面的统一战线，当然也适用于人道主义、人性论。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对于独断专横的家长作风、飞扬跋扈的“长官意志”，对于“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自由、平等等等的要求总不能不是一种破坏力量吧？难道能说它们是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家长作风、“长官意志”、法西斯式的暴行吗？如果如实地把人道主义看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积极成果，那末像家长作风、“长官意志”之类的封建意识，像法西斯式的罪恶行径，也就更易看出它们的落后或反动，更易为人们所唾弃和憎恶了。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之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就因为人性论、人道主义中还有着合理的因素。例如平等，恩格斯就明确说过，随着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出现，也产生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这个平等要求或者“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对立的自发的反映”，或者“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映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手段”。（《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版，第10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种“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能够成为“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反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在读莎士比亚喜剧作品能够产生某种共鸣的现实的客观原因。

当然，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终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我们肯定人性论、人道主义在今天的某些有益的作用，也不是为了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相混同。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同时，就说明了它与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原则区别：资产阶级是为了消灭封建的“阶级特权”（同上，着重号是原有的），无产阶级则是为了“消灭阶级本身”（同上）。列宁在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利用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无神论著作时，也强调要对它们加以“删减”，附以“跋文”。这就不仅表明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而且还说明思想文化领域内的统一战线，必须置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之下，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我们在读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时，虽有“共鸣”，但决不会融洽无间，毫无隔膜，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如果我们读莎士比亚喜剧的这种感受，以及对这种感受的论理的认识还有一定道理，那就只能表明：人性论、人道主义在今天的价值，既不能绝对否定，一概抹煞，也不能全盘肯定，一味歌颂，须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应该承认它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在我们评论诸如文艺复兴时的作家作品时是不妨予以认真注意的。

葛朗台的家产

葛朗台老头一生秘不公开他的财产数目。但他特别喜爱黄金，直到临终前，神父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的嘴边，他猛然扑了过去，企图抓到手中。这一最后的动作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葛朗台老头死后，人们得知他的女儿拥有一千七百万法郎的财产。这笔财产有多大呢？

在葛朗台老头家里做女佣的拿依，一年工资六十法郎，她要在葛朗台家做佣工二十八万三千三百三十四年，

才能挣得这笔财产。

《无神论者做弥撒》中，挑水夫布尔查把他二十二年来积蓄的六百法郎赠给德普兰，如果布尔查照此积蓄下去的话，他需要积蓄六十二万三千三百四十八年，才能积得一千七百万法郎的财产。

幸好，连产生葛朗台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不可能“活”上这么久。否则，布尔查、拿依他们的出路何在？

（刘尾尾）

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无容否定

秦 德 儒

野心家、阴谋家姚文元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炮制了《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文，借批判修正主义为名，毫无根据地否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曾经起过的历史进步作用。

我认为，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必须联系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从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立场描写生活，用资产阶级的人道反对中世纪的神道，用资产阶级的人性反对封建神性，用资产阶级的理性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从思想文化领域向封建主义展开猛烈进攻。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作家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大造舆论。这些资产阶级文学在历史上都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姚文元认为它们“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没有一个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没有反映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毫无价值可言。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在地主阶级专政时期，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都是受压迫的。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压迫，出于它本阶级的要求，也符合当时劳动人民的利益。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统一的整体，我们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不能把它本阶级的利益和当时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说资产阶级的批判只为本阶级的利益，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列宁曾经批判这种凡是“资产者”都是自私的错误观点说：“我们往往是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名词，把它（不区分历史时代）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向导）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四十——六十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他们完全是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列宁全集》，第二卷，444—445页。）资产阶级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反封建的与劳动群众利益相一致的一面，只抓住剥削的相对立的一面，否定和劳动人民相联系的有利的一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封建统治下，反封建压迫是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共同的要求。资产阶级文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同时从这个侧面也间接反映了劳动人民憎恨专制压迫，要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况且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世界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同情劳动人民，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劳动人民的观点批判社会，这就往往直接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怎么能不分析地说一切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都丝毫没有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呢？诚然，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品，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如果这成为否定资产阶级文学的理由，那么过去一切文学遗产

都该否定了,因为它们都没有超出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都属于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

至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进步意义,革命导师也都早有定评。但姚文元却认为它是出现在“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和无产阶级开始发展起来的时代,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对资本主义都进行了批判。但这两种批判……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都是和无产阶级观点相对立的“改良主义”、“个人享乐主义”和“调和阶级矛盾的‘人类爱’”,“比起今天共产主义理想来,都是十分渺小的”,因此都值不得肯定,这也是一种奇谈怪论。

十九世纪欧洲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还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出现了无产阶级的文学、从无产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否定资产阶级文学的历史意义。法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只有短短两个多月,十九世纪整个欧洲都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之下,一切报刊书籍出版、发行大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真正无产阶级批判社会的文学是很难公开出版的,资产阶级作家能从人道主义立场批判社会黑暗,使读者憎恶和反对腐朽的资本主义,这就有利于民主革命运动,怎能因为有过无产阶级批判的文学,就完全抹煞资产阶级文学批判的意义呢?即使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创作,如果能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社会,对促使资本主义的灭亡,往往会产生有益的影响,我们也要肯定它一定的进步意义。

既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他的批判自然会有“改良主义”、“人类爱”等等缺点,这是它的阶级局限性,并不奇怪。如果没有这种缺点,都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他们岂不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作家吗?那才是咄咄怪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是同时并存的,我们要批判和克服它的缺点,也要肯定它的积极意义。我们要高举无产阶级革命大旗,决不提倡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但决没有理由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人道主义文学批判的积极意义。

托 尔 斯 泰 创 作 经 验 谈

△没有人和人类生活,便没有科学和艺术。

△任何艺术潮流,都不能脱离社会生活。

△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无懈可击地解决问题,而在于促进人们热爱丰富多采的、永不枯竭的生活。

△没有什么比艺术中的因循守旧更为有害的了。

△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是作者的灵魂。

△诗是心灵之火。这火能点燃、温暖、照亮人心。

△只有当你感到非写不可时,你才下笔。

△只有当你感到有一种崭新的、重大的内容,自己已经懂得,而别人尚未懂得;只有当你感到非把这个内容表达出来,否则不得安宁时,你才可以动笔。

△象沙里淘金一样,一切美好的、鲜明的思想都是经过洗炼而得的。要多多思考,少动笔;已经写好的,不惜多扬弃。

△艺术家的全部用心在于努力使自己的作品通俗易懂。

△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话来表达。

△如果我是沙皇,便要颁布一项法令:凡作家用词,本人也不解其意者,便剥夺他的写作权,并给他一百大板。

△坏书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应该首先阅读熟悉历代优秀作品和各民族的优秀作家。

——选译自《文学俄罗斯》1978年第36期。

北大俄语系文学教研室供稿。

致读者作者

经过去年的内部试刊，这份杂志现在作为一种公开的出版物，忝列于我国雨后春笋般的书刊之林，呈奉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战的人民面前了。首先，我们要诚挚地感谢广大读者和作者同志们！在你们的鼓励、支持和推动下，杂志总算是有了些微进步。

照理说，在公开发行的时候，好象应该有点类似宣言性的东西，向社会介绍杂志的编辑方针和学术思想倾向。可是，宣言对于杂志这桩群众性的事业，向来不那么合用。编出来的同原先的宣言并不很一致，甚至越编距离宣言越远的情况，在过去是常见的。老编辑往往爱说，不是人编杂志，而是杂志编人，大约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一份刊物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水平，能不能有一定的风格，的确不能光看编者的主观愿望。客观的、物质的条件方面且不去说它，读者的要求和希望，作者的兴趣和水平，才是影响刊物面貌的主要因素。所以，宣言一类的话，这里暂时免却吧，还是请阅读刊物，以它来检验我们，用它来批评我们，从它出发来帮助我们，为了它，多多给我们赐寄稿件！

办刊物，自然第一要认定服务的具体对象。请允许摘抄一段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的章程：

“《外国文学研究》（季刊）是本学会出版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专业性学术刊物，以广大文学青年、中小学语文和外语教师、大专院校学生，中等学校部分高年级学生，以及业余和专业文学工作者为主要服务对象。刊物编委由理事会和有关单位协商聘任，可以随时改聘。理事会对刊物编委会的编辑方针和学术倾向不进行行政的干涉，以充分发挥其民间性的特色；刊物编委会自行对党和广大读者负责。”

我们想补充说的是，关于“民间性”的体会。民间性，大约首先意味着有较充分的学术民主；刊物所登载的稿件，无需经哪一级文化领导机关和它的首长审查，也不经哪一种学术机构或团体及其权威过目。文责自负嘛！民间性，就是未经准授权，不代表任何团体说话；这可能更适于用民间方式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自由开展学术讨论。民间性，唯其是民间的国内出版物，胆子也许可以更大些；学术无禁区，在民间谈学术问题应该更无禁忌。民间性，刊物作者的“圈子”将扩大；本来，办刊物，就该逐步有一支比较稳定的作者队伍，有了“民间性”这一条，大约“圈子”一定是可以广大一些的。民间性，也许能充分发挥刊物约请的学术顾问的作用；因为是民间往来，顾问同志讲起话来客套的成分会少，民间刊物接受他们的指导也应该更虚心、更诚恳。民间性，从主编到编委，都各各有自己的岗位工作，全属兼职，这就便于向群众和专家学习，也便于发扬三十年代“皮包杂志”优良传统的一面。

总之，对于“充分发挥其民间性的特色”的希望，我们衷心拥护，相当欣赏，将努力去实现。只是不知道体会可曾正确，谨以求教于广大读者和作者。

——编者

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

柳 鸣 九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的一次学术发言，共分五个部分：一、问题的提出；二、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和看待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状况；三、如何看待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思想基础；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掌握正确的批评标准，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进行科学的评价；五、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艺术特点与外为中用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本刊分两期刊登。后两个部分将于本刊今年第二期续载。

一、问题的提出

相当长时期以来，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陌生的可怕的领域，在一般人看来，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思想内容是颓废的，表现方法上是违反艺术创造规律的，甚至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性。对于现当代文学中继承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那一部分，虽然我们也给予某种肯定，但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保留，常要指出它“较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一种蜕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进步作用愈来愈小”等等。至于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其他部分，即我们通常所谓的现代派文学，则完全被否定，不能公开出版，图书馆里也很难找到，大学讲坛上更是从不讲授。

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是“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四人帮”的“彻底批判”、“彻底扫荡”在文化上造成了一片荒芜，既然历史上那些早已有定评的优秀文学遗产都遭到了他们的“扫荡”，当然就不会有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存身之地；既然他们已经把矛头指向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外国优秀文学遗产的科学论述，当然更不容许人们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姚文元对法国十九世纪下半期作曲家德彪西（1862—1918）大打棍子就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德彪西是一个印象派作曲家，他的印象派的手法对于音乐技巧的创新是有一定意义的，而这位作曲家仅仅因为是“资产阶级的”，“反现实主义的”而被姚文元一棍子打死，甚至连那些肯定过德彪西的同志也不能幸免，他们对德彪西

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为他们的一条罪状。

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文化专制主义，对我们来说，还有认识上和理解上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接受了日丹诺夫的影响。日丹诺夫于一九三四年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这样说：“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与腐朽，这就是现在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状况的特色和特点。资产阶级文学曾经反映资产阶级制度战胜封建主义，并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伟大作品，但这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论题材和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普遍地在堕落……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官画片，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衰颓和腐朽的特征。资产阶级文学家把自己的笔出卖给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它的著名人物，现在是盗贼、侦探、娼妓和流氓。”日丹诺夫的这篇演讲在解放初期就已经翻译介绍到我国，其中关于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上述论断，实际上成为了我们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日丹诺夫的基本论点和基本语言，一直得到广泛的引用。

日丹诺夫的这段话体现了当时苏联文艺政策的一个方面。那时，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是敌对的，因此，对资本主义文化采取这样一种警戒、排斥、否定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根据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我们在国际上要组织反帝、反殖、反霸的统一战线，我们并不是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敌对状态。在反霸斗争、特别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的斗争中，我们和第二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就需要有所联合；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即使是对追求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应该“知己知彼”。而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正是我们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现实的重要途径。因此，按照日丹诺夫那种态度，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一概加以否定、一概加以排斥，与我国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称的，于我国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任务也是不利的。

而且，在文化上闭关自守、坐井观天，实际上也行不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的是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情况，那时，由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封建性的闭关自守，互相隔绝的状态完全被打破，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互相影响更加直接、更加深远，以至在当时的欧洲的范围，出现了共同的文艺思潮、共同的文学表现方式和共同的文学主题。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情况尚且如此，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随着统一的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的不断改进，新闻出版物的迅速传播，世界各国人们在地理上、空间上的距离已经缩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世界文学”形成的趋势就更为明显了。在这样的世界环境中，要闭关自守、盲目排斥外部世界的一切事物，终究是不可能的。那样做完全违反世界历史的潮流，是一种虚弱的、对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现。“四人帮”违反毛主席“外为中用”的原则，借革命的词句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正是因为害怕自己腐朽的封建法西斯的躯壳，一遇到外部的空气就会化为乌有。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今天，全国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开始新的长征，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勇气。革命的无产阶级敢于宣布自己是“拿来主义”者。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我们必须善于对一切来自资本主义

世界的东西进行科学的分析，吸取对我们有用的部分。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审议四十多年前日丹诺夫的论断，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重新加以评价。

二、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和分析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状况

日丹诺夫把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说成一片反动腐朽，在理论上找了一个根据，就是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搬用在文学问题上，逻辑似乎是这样的：既然帝国主义阶段是腐朽、没落、垂死的，那末，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学就必然是反动、腐朽、没落的。用日丹诺夫的话来说，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与腐朽”。

能不能这样简单地、机械地搬用革命导师的科学论断呢？我认为，这样搬用是形而上学的。首先，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的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关于艺术，谁都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一般发展相适应的”。文学史上很多事实都说明了这点。谁都知道，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产生于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而是产生于反动、黑暗的农奴制的社会阶段，我国历史上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歌的繁荣，也是出现在开元天宝盛世之后社会转入动荡衰败的时期。这是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说。即使是在历史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对抗的阶级、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从没落阶级里也不是不能产生出杰出的作家、优秀的作品，托尔斯太就是一个例子。何况，对列宁的论断，也应该结合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加以实事求是的理解。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科学地总结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论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特点，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正如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见帝国主义阶段某些特殊规律一样，列宁在二十世纪初也不可能预计到二十世纪后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具体情况，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就不能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死亡是指日可待的。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人类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之为过渡时期，并指出它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因此，“垂死”只应理解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既然社会主义逐步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那末，在这过程中资本主义在某个时候还有某种回旋的余地，就不足为怪。显然，我们就不应简单地理解列宁的论断，并把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再进一步用在文化问题上。而且，把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都看成“反动”、“腐朽”、“颓废”，也不符合列宁的两种文化的论述。既然如列宁所论述的，在俄国革命前反动农奴制统治的时代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那末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什么只能有一种“反动腐朽”的文化呢？虽然列宁是讲由于俄国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对抗，才产生了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与“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但他的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方法，这种方法对分析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也是完全适用的；正因为资产阶级内部存在复杂的矛盾，资产阶级文学就必然具有不同的成分和倾向。用这种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分析，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中的确有不少反动、腐朽、颓废的作家和作品，但绝不能说都是反动腐朽的。让我们从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来加以说明。

（一）从作家的社会活动、政治表现来看。

在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中，具有进步倾向、从事过进步的政治社会活动、表现了社会正

义感的作家是相当多的。不用说象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肖伯纳这样一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传统的继承者，政治上无疑是进步的，值得我们肯定；即使是那些我们过去所否定的资产阶级现代派文学的作家，其中也有不少人是进步事业的赞助者、参与者，在政治上颇有可取之处。现代派诗歌最早的代表人物波德莱尔，过去在我们眼里是一个要不得的“恶魔诗人”，其实他是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这次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发动者和主力军是巴黎的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的高潮的几天中，波德莱尔参加了起义的行列，战斗在巴黎的街垒上。早期现代派诗歌巴那斯派的领袖人物勒龚特·德·李勒，也参加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他还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信仰者。组织过傅立叶主义的法朗吉，为此，他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绝裂了。十九世纪后期著名的象征派诗人魏尔伦、韩波，都同情过巴黎公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达达主义、二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家如苏波、艾吕雅以及阿拉贡，在当时都带有左倾的倾向，后来还参加了共产党。法国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洛，苏联的评论认为“他把自己作为作家的职业用来作无原则和冒险主义的政治投机。在经过不止一次向左翼分子挤眉弄眼之后……终于在法国的反动阵营里安身立命了”，这一带有明显偏见的评论对我们也很有影响，妨碍了我们对马尔洛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其实这位作家的政治方面，是应该得到我们肯定的。二十年代他到过中国，同情中国革命，参加过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后回到法国，在三十年代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和当时的法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和“世界反犹太迫害同盟”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九三六年，他参加了西班牙革命政府反对法西斯势力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从事地下斗争反抗纳粹占领，战后是戴高乐派的重要人物，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对中国态度友好。这样一个作家怎么能说是“在法国的反动阵营里安身立命”呢？同样，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过去在有的评论中，也被称为“反动倾向的作家”，但我们知道，萨特在一九五二年为抗议美国侵朝战争而参加了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反对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六十年代，他又反对美国在越南进行战争，七十年代，他支持两家革命的小报《人民事业报》与《解放报》。对这位作家这些政治表现，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再如荒诞派戏剧作家，其中有的人也并非我们所想象的“反动分子”，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贝克特曾经也是一位反纳粹的斗士，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爱尔兰，闻讯以后就赶回巴黎投入地下斗争。这个流派的另一个作家阿达莫夫也是反法西斯的，而且他还是一个有名的“左倾”的作家，一九六〇年，他以巴黎公社的题材写出了剧本《一八七一年春》，因此，资产阶级评论家甚至认为他“转向了共产主义”。

总之，在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反动作家，事实上象美国的庞德、意大利的邓南遮、英国的奥威尔这类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作家或反共的作家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作家往往是在某一时期、某个问题上表现了违抗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反动社会势力的政治态度，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进步的意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来说，他们虽然并不是可怕的革命者，但的确是可厌的“异己分子”。那末，为什么在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中会出现这样一大批统治阶级的“异己分子”呢？

（二）从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阶级地位来看。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在资产阶级文学这个领域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着绝对的优势。只要略作一些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作家来自资产阶级